

“二十四孝”在日本

撰文/秦岚

前些日子笔者读日本的文学杂志《文学界》，看到大谷大学鹫田清一教授《孝敬双亲这种奇妙的行为》的随笔。文章开头就讲：“所有的生物都产子。很多生物只管生子而已，但最少哺乳类是会育子到成年的。至于说赡养，养育是先出生者为后出生者操劳，赡养与此相反，是后出生者为先出生者操劳。这种操劳，只在人的身上才能看到。”（《文学界》2011年第11期）赡养即为孝。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孝亲故事不绝于史。在历史典籍中，把孝行故事汇集到一起的做法并不少见。不仅正史中孝悌事迹常被列为专节专项，而且还有汉刘向所编的《孝子传》这样的专集性书籍。在所有孝行故事集中，“二十四孝”因为汇集了古代影响最大的二十四个孝行故事而最为著名，其中，元人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最为流行。郭居敬，《尤溪县志》记他笃孝，好吟诗，“尝摭拾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序而诗之，用训童蒙”。虽然这部《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是最流行的版本，但把“孝”与“二十四”这个数字连在一起，却并非始自郭居敬。在敦煌藏经洞曾发现唐末五代和尚云辨所作变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可见把两者连到一起显然有更古老的源头。

众所周知，“二十四孝”共收集了二十四个孝子故事，其中情节奇拔者有之，故事匪夷所思者有之，但主旨都是宣传一个“孝”字。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二十四个孝子故事中，哪一个最有名？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很难找到一致的答案，但在日本却是有明确答案的。在日本流传最广的孝子故事，一是“孟宗哭竹生笋”，一是“郭巨为母埋儿”。日本的古都京都是一座典型的观光城市，这座城市有著名的“三大祭”——葵祭、祇园祭、时代祭。其中的祇园祭起源于9世纪，当时日本发生大规模的瘟疫，为此在八阪神社举行御灵会祈福消灾。970年以后，这种祈福消灾变成每年固定举行的年中行事，持续到今天已有千馀年的历

史了。祇园祭的看点是三十二台神輿的巡行,巡行期间通路两侧总是被观赏者围得水泄不通。神輿类似于嘉年华会的花车,但大多修造历史悠久,形式非常特别并各有主题,均称作“某某山”。这三十二台神輿中,就有两台与二十四孝故事相关,以孝为主题,一台是“孟宗山”,又称“笏山”。“孟宗山”上面的竹子上挂着“白雪”,孟宗头戴斗笠,身着唐装,一手扶着扛在肩上的铁锹,另一只手扶着挖出来的大笋。“郭巨山”神輿在一千六百年前神輿抓阄排队时已经排在第十六位,足见其来历的久远。今天使用的“郭巨山”是金胜亭九右卫门利恭1789年的作品,神輿上



记述祇园祭的《山鉾由来记》的插图,画面为18世纪的“郭巨山”。



一勇斋国芳“二十四孝童子鉴”系列之一——《杨香救父》。有趣的是,在一部分日本画家笔下,女孩子杨香变成了男孩。



一勇斋国芳“唐土二十四孝”系列之《郭巨埋儿》。注意檐头画的芭蕉叶，明显不是中原的植物。研究表明这是受了荷兰出版的《东西海陆纪行》之影响。

郭巨、童子和金釜样样俱全。这座神輿在1962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民俗资料，是祇园祭神輿中老式大式的存在。这两座每年被拉出来巡行的神輿正可以告诉我们，“孟宗哭笋”和“郭巨埋儿”的故事在日本是如何的家喻户晓。

中国古代孝子故事传到日本的年代非常早。《宇津保物语》是成书比《源氏物语》还要早的日本古代长篇小说，以遣唐使为主人公。第一卷中，主人公俊荫死后一段，重点写俊荫之子仲忠孝敬母亲，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代孝子王祥、孟宗、杨香等人故事的影子。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今昔物语》收有大量民间故事，其中中国部分“震旦”第九卷是孝子专辑。饶有趣味的是，在这部分孝子故事里，有两个后来被收录进“二十四孝”故事系列中，它们正是祇园祭中出现的“孟宗哭笋”和“郭巨埋儿”。由此可见，这两个孝子故事传入日本年代之久远。元代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图文并茂，所以流传到日本后后来居上，成了孝子书中影响最大的版本。不仅当时和中国文化传播密切相关的五山诗僧，就连当时的贵族家都对“二十四孝”非常关心。《凉荫轩日记》是15世纪贵族家日记的代表。其7月17日（1458）条云：“能阿弥，依二十四孝之绘来而有评议也。”另一本由山科言经所写的公家日记《言继卿记》，也多次提到“二十四孝”的和注问题。

《御伽草子集》收录中古以后日本流行的短篇故事,也收入了和译《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当时从中国进口的二十四孝屏风,也大受欢迎。

“二十四孝”故事传到日本后,也应和日本风土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御伽草子集》中收入的“二十四孝”之“丁兰刻木”,在中国的情节是丁妻用针刺木像,木像流血,丁兰为此休妻。在日本,这个故事的结尾变得很复杂:丁妻用火烧焦了木像,为此丁妻的脸发肿出脓,头发尽皆脱落;后来丁兰把木像摆在大道上,丁妻为表歉意之意拜了三年,有一天木像居然自己回到了家里。再比如“杨香驱虎救父”,日本版本杨香并没有冲上去和老虎搏斗,而是正心诚意对神祈祷,让自己代替父亲被老虎吃掉,结果精神感天,老虎自己走掉。中国的“二十四孝”版本不同,所以孝行人物略有出入,这使日本的翻译者产生许多困惑。认真的日本人不知道该如何取舍,把能列上的都列上,所以还出现了题为“二十四孝”、实际却收有二十七位孝子故事的情况。

在江户时代,可以说凡是流行的几乎都会在浮世绘这种大众传媒上有所体现,而浮世绘一旦有画行世,又必将推进流行的扩展。受到百姓喜爱的“二十四孝”,成了浮世绘画家们反复描画的人气题目。单是浮世绘的世界大师级人物一勇斋国芳,我就见到过他创作的两套《二十四孝》。江户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孝的观念当然被主流社会强调,经过长期流传的二十四孝,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了日本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江户日本人喜好游戏,并且能玩出花样。有了“二十四孝”这个概念,他们就开始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玩起来。以歌川丰国“二十四好今样美人(江户美人最新喜好)”为主题的浮世绘系列作品为例。图中这位美人喜欢“祭”,即喜欢过节。画面上文字大意是说她为什么喜欢过节,因为过节大家就会走到街上看表演,她这身美丽的和服也就有机会展示给自己喜爱的人看。



三代歌川丰国“二十四好今样美人”之《祭り好》



一勇斋国芳的“见立二十四孝”之《老菜子》。画面里所绘的三位女子，都是当时有名的艺伎。

铃木春信的《见立孟宗哭笋》。这幅画是浮世绘作品之一，画面线条洁净，色彩柔和清丽，在普遍以浓墨重彩为主的浮世绘中显得非常突出。

丰国的这套画共二十四枚，全力展示的是当时江户妇女弹琴、饮茶、侍弄盆景等各种喜好。之所以是二十四枚，就是因为这套作品借用了“二十四孝”的概念。题目“二十四好”的“好”，日语中是喜好的意思，并且“好”与“孝”在日语里读音相同，都读“kou”。一音之转，这套画的框架就直接从“二十四孝”转借过来。谐音之外，江户时代还有一种以物喻物的游戏法，叫“见立”，就是展示给你的画，其实暗喻的是另一个为人所熟悉的构图和故事。图中是一个美人给两个老人表演舞蹈，标题写得很明白，是拿“二十四孝”做的“见立”。有趣的是这幅画的背景：一对老夫妇样子的老人在看一个长须人游戏。这幅“老菜子图”是一勇斋国芳“二十四孝见立”的二十四枚作品中的一幅。有了后面的背景，观者就会极自然地看图推想了。但如果看铃木春信的《见立孟宗哭笋》时不加说明文字，大概就没有

几个人能从上面看出“二十四孝”的影子了。用“二十四孝”做文章的画家,此后一直不乏其人。直到昭和六年,以描绘艳妆女子闻名的成田守兼,还创作过一套“艳姿二十四孝”。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孟宗哭笋和郭巨埋儿这两个故事上来,说一说这两个故事在日本是如何变形的。歌舞伎名剧《本朝二十四孝》搬演的是日本战国时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之间的故事。剧名《本朝二十四孝》的来由,应该说与剧中著名的军师山本勘助哭笋的情节相关。山本出山前,母亲为试其孝心,令其出门寻找竹笋。时值冬日挖不到竹笋,山本勘助愁得对天痛哭。此情感天动地,冬土中

竟生出竹笋。山本母得到满意答卷,于是鼓励山本出山。很明显,这段戏实际上是孟宗哭笋的搬用和变形。此剧后面的剧情着重于前述故事,其中谦信之女八重垣姬和信玄之子胜赖幼小时定下婚约,后来八重垣姬为救未婚夫私携宝物借狐火飞奔追赶胜赖成为重要看点。浮世绘中和“二十四孝”相关的最美的画作,当为活跃在明治前期的浮世绘大师月冈芳年《本朝二十四孝》的《狐火之图》。这幅《狐火之图》画的即是长大的八重垣姬为救自己的未婚夫,背着父亲、手执信玄与谦信为之争斗不已的諏访法性盗兜,借着狐火之力追赶胜赖的情形。画面色调白红相间,八重垣姬为狐火围绕飘然腾空。有趣的是,画中主人公虽在赶路,但并不是义无反顾地箭一样“前奔”的形象,而恰恰是“反顾”观火,偏着头,神态专注。看着画,仿佛都可以听到八重垣姬在叮嘱、拜托着狐火:“快助本姑娘早早追上他啊!”信玄与谦信在日本战国时期可谓一时瑜、亮,他们之间的故事本来就很受观众欢迎,加之扮演八重垣姬的歌舞伎演员在表演上大下功夫,所以这出戏最终



月冈芳年《本朝二十四孝》之《狐火之图》。



一阳斋丰国《石川五右卫门与一子五郎市》，描绘石川父子受釜刑的情形。画面上石川高举起儿子远离沸腾的铁锅，可见贼亦有慈父之心。这段故事还有另外一种版本：为了不让孩子多受罪，石川一下把孩子按到了锅底。

被打造成了歌舞伎的经典剧目，直到今天仍旧深受人们喜爱。

除《本朝二十四孝》外，日本还有《皇朝二十四孝》、《今样二十四孝》、《大倭二十四孝》等等。在这里最后想介绍的是井原西鹤的《本朝二十不孝》。这部作品讲的是不孝的故事，却毫无疑问是拿中国“二十四孝”作背景的。西鹤在《本朝二十不孝》序中说：“雪中之笋就在于菜店，鲤鱼亦见在鱼铺池里。如今之世无需外求，各营本业以其所得，足购万物以尽孝，常也。然此常翻为希见，而恶人众多。凡生而不尽孝之辈，难逃天咎。今刻梓其例置于诸国见闻，以显不孝之罪于不孝者眼前，斯亦孝道之一助也。”“雪中之笋”用的是孟宗故事之典，“鲤鱼”所指即为王祥卧冰求鲤。在西鹤看来，江户时代物质富足，冬天菜店中也有盐渍竹笋，鱼铺里也有鲤鱼。在这样的时代要尽孝不遑外求，只要用心即可，然而世上偏偏多的是不尽孝的恶人。

“二十四孝”作为西鹤写作《本朝二十不孝》的背景，还体现在更深的层面。比如卷二故事开篇就讲了一句“掘坑见釜，不见于今世”，写的是大盗石川五右卫门作恶多端，殃及儿子，最后父子二人同被丰臣秀吉处以釜刑。石川五右卫门是丰臣秀吉时代有名的盗贼，他被处釜刑一事在当时非常轰动，连当时在日本的西班牙商人阿比拉·希伦在《日本王国记》中都有记载。那口处刑的铁锅，据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保存在日本的刑务协会。关于“掘坑见釜，不见于今世”，研究者们早已明断其所指为郭巨埋儿、掘地见金釜的典故。郭巨尽孝挖土挖出的是“釜”，石川五右卫门被处釜刑用的也是

“釜”，把这两个“釜”遥相呼应地叠加在一起，正是西鹤这部小说的结构方法。卷四《善恶之双车》之于董永与江革、《木阴之袖口》之于闵子骞，都存在同样的结构。由此亦可见，中国的“二十四孝”一直时隐时现于《本朝二十不孝》整个作品的背后。

进入明治时代，中国思想失去了权威，“二十四孝”也变成了被攻击的靶子。那些奇拔的情节和匪夷所思的故事，被科学化和逻辑化无情地批判，其中尤以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火力最猛：

古来和汉劝孝之说甚多。以二十四孝为核心，其外之著述亦难尽数。然就此书观之，所劝十之八九为人所难为之事，亦或所言之事愚痴可笑，甚或褒誉背理之事以为孝行。严寒之中裸身卧冰待其融化，乃人所不能为者。夏夜洒酒濡体饲蚊虫，以防其近父。如此以酒银购纸帐岂不为智者乎？无赡养父母之收入亦无办法，却欲活埋无罪婴孩之心肠，当曰鬼当曰蛇，可谓伤天害理之极。早前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此反将既已出生之子活埋以绝后，则何者为孝哉？岂非前后矛盾之妄说乎？此种孝行之说，意在正亲子之名，明上下之分，而强逼子女而已。

没有了“同情之理解”，“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瞬间会变得“愚痴可笑”。可惜当时福翁不曾也不敢用这副科学化和逻辑化眼镜看《日本书纪》或《古事记》。从这一意义上说，2009年日本画家缕衣香的《绘本二十四孝物语》出版并得到社会上好评，对于日本的“二十四孝”接受史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重新审视东亚文化传统的时代也许真的到来了。

整理创作《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郭居敬生平爱写诗，但留下的作品非常少。20世纪末，日本学者金文京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不见诸家著录的《新编郭居敬百香诗选》抄本。有赖日本人在十四五世纪抄下这部《百香诗》，我们才能对郭居敬的其他诗歌作品有所了解。这是和“二十四孝”相关的中日文化之间的一段特殊缘分，在这里多言一句记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